

群体心理与梁启超 启蒙小说理论的形态

蒋述卓 郑焕钊

社会心理是晚清知识分子考量社会的重要维度。深谙群体心理学的梁启超,正是根据他对群体心理的理解,明确而有目的地构建小说理论。(一)借助现代报刊传媒的舆论感染,他将传统小说的弊端推至极致,引起改造小说的紧迫感;(二)选择中层知识分子群体作为启蒙对象,通过政治小说这一中介,消除传统士人鄙视小说创作的心理障碍;(三)引起国族共同体想象,从而试图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完成启蒙任务。群体心理学深深地应用在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形态之中。考察文学运动理论形态的群体心理学维度,对我们把握理论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启示。

晚清维新启蒙主义文论,在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①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框架下,小说以其感染力与通俗性,被看作开民智与改良民德的重要途径,启蒙思想家寄予强烈的期待。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改良本质,维新派启蒙思想家并不直接面向底层的“下流社会”启蒙,而是希望借助于中间层知识分子和乡绅来完成启蒙的任务。这体现了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对底层的不自信,同时又使得这种启蒙,与当时民间社会通过“白话报刊”、“阅报社”、“宣讲”、“讲报”、“演说”等对底层实行的“口语启蒙”^②明显不同。

选择中层知识分子群体作为启蒙对象,借助现代报刊传媒来宣传,引起国族共同体想象,从而试图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完成启蒙任务,成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理论的特色。此一文学运动,虽然最终未能实现梁启超预设的目标,但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以及由“诗文”向“小说”的文体的转变,产生深刻的影响。

启蒙小说理论面向特定的群体,与群体心理密切相关。如果说创作是一种倾向于无意识的个体心灵流露,理论构建则明显面向特定的对象,带有明确的目的。因而,与以个体人格心理学研究艺术创作动机、心态、过程等不同,理论建构,尤其是带有宣言式、论证式、运动式的理论的建构过程,根据的便是言说者与特定对象群体之间的特殊心理关系。这种关系又不同于读者接受心理——读者心理对文本的接受与传播——它发生于言说者对自己理论群体的

心理预设,并根据这种预设来塑造自己理论的形态。因而,群体心理在此过程中居于中间的位置,连结着言说者与对象群体,是言说者借以表达与形塑理论的依据,深刻地影响着理论的形态,并影响理论的进展。这便与研究作家与读者心理的两端区别开来,对研究文学运动的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理应成为文艺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报刊巨子”,梁启超如何借助对群体心理的洞察和运用,来实现这一目标,同时如何影响着启蒙文论的理论形态,便成为我们理解这一过程首先需要考察的对象。

—

晚清“小说界革命”是在知识分子普遍重视群体心理——社会心理的情况下展开。从洋务运动的器物到维新变法的制度,都未能挽救晚清亡国的命运。晚清知识阶层开始关注社会精神,从社会心理、民族性等角度,来思考民族的命运。心理学在这一背景下被引入中国,孙本文指出:“在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社会学上最重要的讨论,即在有机的推论与种族决定论二者。”“大抵自生物有机体论衰落后,即代以心理的社会学说。十九世纪之末,以至二十世纪初期,此派渐盛,1910—1920年之间,其学说尤风行一时。”^③进化论、种族决定论、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成为晚清知识阶层理解族群生存、探讨族群命运的科学依据。

梁启超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大量译介西方思想,发表有《新民说》、《新史学》、《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等文章,已经采用心理学的方法进行分析。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集中表达了梁启超群体心理学的观点。在该书中,梁启超提出“历史的人格者”这一概念,从唯心主义的“英雄造时势”出发,认为“历史之人格者”实为“当时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④;“思想界……政治界文学界艺术界,盖莫不有然”^⑤。正是有历史人格者的主动行为,扩而影响至整个社会,才构成历史的进展。然而单纯的英雄并不能构成历史,“‘首出的人格者’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实则此一人或数人之个性,渐次浸入或镌入于全社会而易其形与质。社会多数人或为积极的同感,或为消极的盲从。而个人之特性,浸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亦得名之曰集团性或时代性。”^⑥“‘群众的人格者’理论上固为群中各分子各自个性发展之结果,固宜各自以平等的方式表显其个性。然实际上其所表显者以另为一之集团性或时代性,而与各自之个性非同物。且尤必有所谓‘领袖’者以指导其趋向执行其意思,然后此群众人格乃得以实现。”^⑦梁启超辩证地看到英雄领袖与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出的人格者”只有将自己的精神浸染于群体之中,指导群体行为趋向,才能使其精神影响到社会的形质变化。而所谓群体人格,并非个人平等的体现,而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并非个性的体现。梁启超认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⑧历史学家的任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⑨从民族文化与历史成因出发,梁启超比较了欧美与中国群体心理的差异,认为欧美历史研究,正能够“间接促起民众意识之自觉力”^⑩,而中国历史写帝皇,忽视群体,因而“积极的民众意识者甚缺乏”^⑪。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提倡新史学,采用新的历史研究方法。

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⑫。改变历史研究的方法,采用新的历史观,实

在与当下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从“新民”的启蒙立场出发,梁启超意在促成群众意识的“自觉”。作为唯心主义思想家,梁启超在该书中表现了对历史英雄领袖的呼唤,但这一英雄行动的成功与否,却直接与其是否建立在社会群体心理意识的基础上直接相关:“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大人物之言动,非以其个人的资格而有价值,乃以其为一阶级或一党派一民族之一员的资格而有价值耳。”^⑬大人物不是以其道德人格来衡量,而是看其是否了解社会心理,是否懂得鼓动社会之心理:“所谓大人物者……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而其效果收获之丰啬,一方面视各该社会凭借之根柢何如。一方面又视所谓大人物者心理亢进之程度何如。”^⑭在这里,梁启超深入地触及群体心理的本质,并揭示出群体心理作用的机制,即暗示、反射、感应,以及领袖的心理亢进程度。它有着科学的根据。

以研究种族心理差异和革命群体心理为主要对象的法国心理学家勒邦^⑮著有《群体心理》^⑯一书。在该书中,勒氏认为,个体在进入群体之后,便获得一种在个体状态下所没有的群体心理状态,体现为智力下降、情绪上涨,反对复杂的逻辑推理论证,接受简单推理与断言。暗示与感染成为群体情绪传达的重要心理机制,而断言、重复、传染就成为实现这一心理的手段。群体心理状态下,喜欢幻象,形象性的作用大于抽象性。群体需要领袖,一个比群体中的任何人都强有力的形象,能够让群体得以形成,塑造共同的信念,不然群体将解体而无法存在。勒氏认为无意识正是主宰群体心理的根本因素。在群体无意识心理状态下,任何不人道的残忍行为,或者相反,任何伟大的、崇高的,任何理智个体都无法做到的道德行为,却能够实现。勒邦从刚刚过去的法国大革命中,研究群众心理的特点,认为群体无意识正是促成历史进程的根本原因。虽然出发点和目的不同,梁启超与勒邦在关于群体心理的特点,即其暗示性、感染性,以及领袖在群体心理中所起的作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弗洛伊德认为勒邦擅长于描绘群体心理,而对于原因,仍然是“悬而未决”^⑰。在《群体心理与自我的分析》中,弗洛伊德几乎全部赞同勒邦对群体心理的描绘并借助人类学和精神分析的方法,来解释群体心理形成的“动力学”原因。由此可见,梁启超群体心理学的科学性,及其对群体心理特点的熟谙程度。他对群体心理与历史关系的重视和强调,正是他开展“小说界革命”的心理学基础。

二

梁启超“小说界革命”是借助于近代报刊来开展。在场的群体心理效果能否在不在现场的报刊阅读中获得实现?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德在1901年发表的《舆论与群体》中,扩展了勒邦“群体”的内涵,发展出“公众”群体。他认为:“印刷术的发明产生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公众,这个意义上的公众从未停止增长,它无限延伸的可能性是我们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已经有一门群众心理学,还需要建立一门公众心理学。这个公众就是第二个意义上的公众,纯粹精神上的集体,由分散的个体组成,他们没有身体上的接触,他们的组合完全是精神关系上的组合。”^⑱塔德认为,日报和期刊的作者,“创造了一股集体的力量,虽然是人为的,然则是真实的”^⑲。报刊的力量,“即使不读报但和读报者交谈的人也会受到影响,也不得不追随他们借用的思想,一支笔足以启动上百万的舌头交谈”^⑳。塔德充分认识到报刊“公众”群体的心理学意义,群体心理的特点在报刊“公众”群体中并没有失效,因此报刊作者的“领袖”以及报刊评论的影响,

将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随着报刊对信息传播途径的改变,近代民族国家开始兴起,“定期报刊取得长足的进步,更加广泛而明显、新颖而突出的民族主义情绪随之而高涨,这种民族主义是我们时代的政治特征”^{②1}。这一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有着生动的说明^{②2}。

作为“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群体心理学的实践应用,正是放置在报刊这一印刷媒体所形成的“公众”群体之中。早在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报刊的重要宣传作用。1898年12月23日,他创办《清议报》,开始启蒙宣传。至1901年12月21日出至100期,因报馆遭到火灾而停办。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清政府下令逮捕梁启超,他逃到日本。1902年2月,他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受到读者欢迎,供不应求,1903年发行量已达9000份,以后又增加到14000份,发行点遍布全国各地。同时,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作为“小说界革命”的主要阵地,宣传启蒙思想,进行“新民”。“小说界革命”正是借助于报刊来完成的。其影响,正如他自己所描述:“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②3}

报刊媒体对群体的暗示以及感染作用,由于群体的精神性在场而非身体性在场,个体精神性相对于群体身体集合时的无意识情绪的诱发,要困难得多,因而对文字语言和情感,提出更为严格得要求。然这并无法难倒梁启超,他既是一名杰出的演说家,又是“天纵之文豪”、“舆论之骄子”,他以其对群体心理的熟悉,以及丰富的舆论经验,创造出一种“新文体”,其特点是这样:“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②4}

“新文体”运用大量的排比、递进、断言,使得感情逐渐累积、爆发,激起读者无限的情感共鸣。比如《少年中国说》: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②5}

其感情如此充沛,希望如此炽烈,呼唤如此急切,而信心又如此饱满,对于当时晚清社会的青年士子,该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和感染力!在国家危亡之际,对于青年的信心鼓舞,有如“五四”游行运动镜头中的青年们的热血喷涌。甚至可以说,“五四”运动正是十九年前“少年中国说”鼓舞下的成长的青年一代的历史表白,情感抒发。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少年中国说》、《新民说》等正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理论的前提和铺垫,它们构成一个启蒙文论的整体。作为“小说界革命”的理论标志《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语言同样铺满排比、充溢着感情: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②6}

通过层层递进,凸显出新小说之重要性。新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格。一言以蔽之,小说对当时中国社会弊病,具有救赎的功能。这里面没有推理,只有断言,有一股不可压制的力量,令人不得不为之振奋,同时又不得不为之震惊!因为在一直以小说为“街谈巷议”、“稗官野史”之末流小道之下,小说被赋予如此巨大的功能,对当时人们的冲击,从语言至观念都是极其强烈的。

新小说正对于旧小说而言。正因为小说的巨大感染力和影响,传统小说为害甚巨:

则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可以识矣。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②

在此断言之下,梁启超进一步论述传统小说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极力描写其影响之情状,梁启超将种种恶习集中,并适当予以夸张渲染其影响的情形。这些情形,所采用的并非抽象的语言,而是人们所熟知的社会现实,即使论述到抽象部分,也用形象的语言进行:

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渍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以自拔,故谓之间接)。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鹜,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骄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缱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消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而其性质、其位置,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③

五层排比之后,梁转用无限感慨之语言,连用两个“乃至如是”,沉痛的心情溢于言表。经过渲染排比,旧小说与当前国族的种种陋习,民族命运的种种危机,便自然而然地嫁接起来。这种对旧小说的痛恨之情,在传统“诲淫诲盗”的固有评价之上,更上一层。于是梁启超便在传统文人对小说歧视的心理基础上,进一步把旧小说推到了绝境,使传统士人对旧小说达到深恶痛绝的地步,体现了梁启超“摧陷廓清”的巨大力量。

然而,梁启超并非一味破坏。他破坏旧小说的前提,是为了使新小说——即政治小说能够引起广泛的重视。既然小说的感染力如此,它具有“熏”、“浸”、“提”、“刺”四种伟力,那么,作为

启蒙思想家,作为有强烈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士人,只有把传统小说改造为新小说,在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之下,才能真正地完成其启蒙的任务。由是,小说界之革命便是呼之欲出的社会行动,新小说的创作也不得不马上开始。而小说以其如此显著的社会启蒙功能,在启蒙主义体系之中,其作为“文学之最上乘!”^②的地位,便稳稳地得以确立。

从前期《少年中国说》、《新民说》、《译印政治小说序》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正是在对语言的巨大渲染力的塑造之下,鼓起读者群体的心理共鸣,从语言、内涵、品格、目标等,为其“小说界革命”搭建了演出的舞台。在当时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梁启超的好友黄遵宪对梁的报刊及其语言魅力推崇备至:“《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③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谈及梁启超文字的魔力:“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有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④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则向我们披露出梁文字影响的层面和范围:“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⑤对于梁启超报刊文字的影响情状,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所著《梁启超传》中所描述的情景,可以作为我们的小结:“至于雷鸣潮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撼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是耳!即以梁氏一人之文论,亦惟有‘戊戌’以后至‘辛亥’以前(约1896—1910)如此耳!在此十六年间,任公诚为舆论界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⑥

三

然而梁启超启蒙的,并非直接面向当时的“下流社会”,而是中间知识阶层。这有思想与理论两个根源。

在面临亡国保种之际,梁启超的启蒙具有急迫性,因而他过多地强调国民义务。虽然在《新民说》中有“权利篇”,但正如黄珏在深入剖析《新民说》后,深刻指出的那样:“他的权利说,只是国民为国家服务和献身的责任,很少谈到如何进行自我保护。他将保种看作是国民的最大利益,但遗憾的是,当时大多数国民想得更多的是油盐柴米,他们更关注眼前直接和实际的利害,而不是抽象的论述,关心土地、工作、物价、日常生活开支,远远胜过关心理论上的是是非非。”^⑦目标与对象群体之间利益的不一致,梁启超应该说深有体会。在梁启超启蒙以前,晚清社会的文化格局之中,并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只有天地、蛮夷的文化观念。由于两千年来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广大士子所遭遇的是中华文化价值的动摇,而民间对于当时列强瓜分之下的政治格局,对于几个通商口岸与京都的变故,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他们的反抗更多的是与现实利益相关。也正因此,由义和团运动所暴露出来的民众的愚昧,才促成晚清社会的民间启蒙。但是梁启超改良主义的本质,决定其对于底层的忽视,以及其启蒙的路径:“虽然梁启超看到并承认生机窘迫对民德巨大的影响,但他既无力也无法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在无可奈何之时,只能将移风易俗的希望,给予学术匡救。他知道培养下层民众的新道德观和改变其贫困的生活同样艰难,非一朝一夕可就,故将‘新民’的对象,转到知识阶层,认为改造社会的主体,不是掌握强权的政府,也不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民,而是既不愁衣食,又有一定思想文化的中产阶级。故维新派的影响也只是局限在士人之中,无法赢得普通民众。”^⑧这是其思想

根源。

具体到文学启蒙,如上所述,旧小说的积弊之深,而小说的影响之广,对于启蒙者而言,舍小说而择其他,不如利用小说来得容易。小说的启蒙当然是面对直接的大众,因其语言通俗、感染力强、形象丰富、叙述生动。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所匮乏的正是启蒙内涵的小说。因此,对梁启超而言,他要去做的工作,首先是指定小说启蒙的内容、创造启蒙小说的创作群体,然后这些创作群体的启蒙小说,影响启蒙底层社会。这就需要分阶段,即先完成对中间知识阶层的启蒙,然后才面向大众。于是,中间知识阶层才正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真正言说的对象群体。陈独秀将自己在《安徽俗话报》发表的《论戏曲》一文,从白话改为文言体后,发表于1905年3月《新小说》,可以作为佐证。而这即是其理论根源。

首先涉及的问题是,中间知识分子阶层何以能构成一个群体?根据群体心理学的观点,群体的形成,必须满足如下条件:这些个体必须彼此间有某些共同的东西,对某一对象共同兴趣,在某种或其他情况中相似的情绪倾向,以及“某些范围的交互影响”,“这种心理同质性”的程度愈高,个体形成一种心理群体就愈容易,并且群体心理的各种表现也就愈显著^⑧。从上述黄坤的分析,“改造社会的主体,不是掌握强权的政府,也不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民,而是既不愁衣食,又有一定思想文化的中产阶级”,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对于启蒙,要求一个类似于哈贝马斯所言的,独立于政府与民间的“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那里,这样的公共领域是由中产阶级所主导,以真诚、真实、准确构成一个“理想的言说情境”^⑨。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梁启超早期把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西方社会的宪政与民主制度成为梁心目中的理想目标,并借助于东方的衣服来包裹西方的思想,形成其“公羊三世说”等政治设想^⑩。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只能借助于舆论来宣传,直接参与宪政的政治改革途径受到阻断之后,他寄希望于社会知识分子的政治干预力量,以印刷媒体为中心的“公共交往领域”便成为梁启超开展启蒙理想的阵地。这在《清代学术概论》与《三十自述》中都有提及。印刷媒体“公共领域”之所以可能,这些知识分子首先必须不为基本的物质生存奔波,要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立场。而近代传统文化的价值所遭受的质疑,作为传统文化理想世界在近代遭遇的动摇、阵痛,以及在“价值与历史”^⑪、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徘徊,所引起的思想矛盾与复杂情感,便构成中间知识分子阶层共同的情绪倾向和心理同质。正是这些使中间知识分子阶层形成群体获得了可能。

从理论上可以论证新小说出现的必要,魅力般的文字也能够造成强烈的情绪冲动。但是面对近两千年来传统观念中对小说的轻视和鄙夷,则让知识分子阶层进入实际创作实践构造了心理障碍。梁启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从《译印政治小说序》至《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通过援引国外贵族政治家创作小说的例子,以及创作内容的政治性两个方面,来提高创作主体的地位,张扬政治小说家的价值,以清除这一心理屏障。这就形成晚清小说理论独特的内涵。

梁启超是从作家地位与作品思想内涵的水准成正比的关系来展开论述。汉代以来,传统小说受到人们的轻视,因而正人君子不愿意从事小说创作。于是,小说创作便流入“华士坊贾”之手。他们道德水平与思想觉悟之低,致使小说内容充满诲淫诲盗之质。这进一步加深鸿儒硕士的鄙视,更不愿意从事小说创作,于是恶性循环,小说便更加堕落:“所谓好学深思之士君子,吐弃不肯从事,则儇薄无行者,从而篡其统,于是小说家言遂至毒天下。”^⑫“自后世学子,务文采而弃实学,莫肯辱身降志,弄此楮墨。而小有才之人,因而游戏恣肆以出之,诲淫诲盗,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非细故也。”^⑬所谓中国社会民间的“文化霸权”,由于知识分子阶层对小说的轻视,而落入“华士坊贾”之手,因小说的影响之广,社会风气便让小说彻底败坏,而圣人君子的道德训诫力量,相比是那么薄弱:“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

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而其性质,其位置,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④2}因此,只有转变创作主体的身份,才能彻底改变小说“诲淫诲盗”的思想内容,引入启蒙思想,完成新民的任务。

创作主体身份的抬高是通过援引欧美日本小说家的地位来实现转换的。早在办《清议报》时,梁启超已经为“小说界革命”做理论铺垫,他认为,泰西小说作者往往是“魁儒硕学,仁人志士”^{④3}。光绪二十六年(1901)十一月十一日《清议报》刊载署名为“衡南劫火仙”的文章,其中提到:“已故前英国内阁皮根之《燕代鸣翁》一集,其原稿之值,获一万镑。法国《朝露楼报》,发行之数,殆及百万册,然其发行之流滞,则恒视其所刊登之小说为如何。此亦足以验泰西诵读小说之风盛于时矣。”^{④4}在宣扬日本政治小说时,梁启超同样宣扬作者的水准和身份:“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④5}“矢野氏今为中国公使,日本文学界之泰斗,进步党之魁杰也。”^{④6}梁启超在《新小说》第一号的“图象”栏,插有“俄国大小说家托尔斯泰像”,而第二号则同时插有“英国大文豪摆伦”(拜伦)和“法国大文豪器俄”(雨果)的头像,并在背面这样介绍“摆伦又不特文家也,实为一大豪侠者,当希腊独立军之起,慨然投身以助之”,介绍雨果,也强调其政治家的荣耀:“器俄不特文家而已,又大政治家也,晚年为国民议会议员,大有所建,自其没也,法人荣以国葬之礼。”^{④7}可以说通过各种手段来提高小说家的地位,借助文字、形象来暗示。既然欧美日本的小说家可以是内阁、中国公使、进步党魁杰,而它们国内之盛、文化之强势,则中国士人知识分子从事小说创作,便不应该再有心理负担。这种通过援引泰西小说家地位的抬高中国小说家地位的表述,在晚清小说理论中,成为普遍的现象。

同时,从传统士人“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向近代知识分子小说家身份的转化,必须从心理与立场上完成过渡。“政治”与“小说”的结盟便成为一种最好的方式。因为一方面“政治”是当时知识分子强烈关注的对象,涉及安身立命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作为创作主体,政治小说具有崇高的目的,能够使得创作家倾于政治热情。在《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梁启超便畅明其旨:“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④8}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选择,基于日本政治小说的成功经验。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梁启超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④9}既然政治小说功能如此之伟,而小说仅仅是一种手段,因而知识分子的心理包袱可以完全地放下。

由此,梁启超拓展其“小说界革命”的理论根基,解决了知识分子向小说家身份的转变,同时指出了“写什么”的问题。在当时中层知识分子中间,取得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康有为发现:“传统士子们大都‘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变而为购阅新小说。”^{⑤0}徐念慈在1908年的一则统计中发现,当时购买新小说的“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却“只有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⑤1}。钱基博指出:“迄今六十岁以下四十岁以上之士夫,论证持学,殆无不为之默化潜移者!可以想见启超文学感化力之伟大焉!”^{⑤2}可见《新小说》传播的人群,及梁启超对中层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这些都无不与其对中层知识分子群体心理的熟悉以及其理论的心理学预设相关。

作为政治家、舆论家与文学家的梁启超,正如其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指出那样:“大

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大人物之言动,非以其个人的资格而有价值,乃以其为一阶级或一党派一民族之一员的资格而有价值耳。”^⑤梁启超从一开始就将自己放置于“大人物”的位置,要引导“时代之精神”。“言动”包含着理论与实践,而梁启超对《新小说》的规划,以及自己亲手创作政治小说,则进一步凸显其作为领袖的一贯的“亢奋”和赤诚。《新小说》栏目的设置,体现出新小说的精神。梁启超预设的栏目包括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语怪小说、札记体小说、世界名人逸事等。而实际刊出的栏目并不完全按照预定的进行,增设了社会小说、谴责小说。实际刊出的栏目可以分为“新”、“旧”两大系统:如社会小说、谴责小说、历史小说等,揭露批判旧社会、旧制度的各种丑恶——这是对旧的批判;而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世界名人逸事等则彰显出一副新的政治制度、新的科学想象世界,塑造与弘扬一种尚武精神、远游冒险精神、科学精神、世界精神以及爱国主义精神。一本《新小说》正是“新”、“旧”两个世界剧烈对比的精神空间。在其中,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的问题,以一种毫不迟疑的姿态进行宣判。而梁启超自己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则可以看作这种选择的未来的历史图景:

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今年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今年二千零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各国全权大臣在南京,已经将太平条约画押。因尚有万国协盟专件,由我国政府及各国代表人提出者凡数十桩,皆未议妥,因此各全权尚驻节中国。

恰好遇着我国举行祝典,诸友邦皆特派兵舰来庆贺,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匈牙利大统领及夫人,皆亲临致祝。其余列强皆有头等钦差代一国表贺意,都齐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热闹。^⑥

万国齐集南京,举行国际盛会,我国五十周年祝典,列强首脑帝皇统领通通来贺,这是多么的群情汹涌澎湃的时刻!而民族的尊严与自信心,该是多么的牢固不可动摇!对于近代以来在遭受列强分割、奴役下,陷入文化自卑心态的传统士人而言,此幅图景,让人多么振奋!这幅图景,也正是梁启超心中的信念所在!他在《〈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中指出:“《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⑦而为此书,他“五年于兹”。可见其倾注的情感和理想。“不管刺激群体想象力的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或仅仅伴之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⑧正是借助这一幅未来新中国的鲜明图景,梁启超唤起晚清知识分子阶层近代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想象,开启近代独立、平等民族国家的启蒙历程。而由此,梁启超作为这样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历史的人格者”的形象,呼之而出。

四

激情的文字、断言式的宣判、低度的逻辑推理、以及充满夸张、排比、比喻的修辞,形象化的描述与生硬的援引,这些正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特点。对梁启超晚清启蒙文论,历来,当学者将其作为“新文体”的范本,予以充分的评价;但当将其看作理论表述形态时,则较多持否定态度,指责它形态幼稚。我们认为,对意图掀起文学运动式的理论的认识,要放在“意图——效果”这一特定过程,来看其是否实现设定的目的,从而给予评价。正如英国社会理论家帕特里克·贝尔特所言,我们经常容易犯“外在化的谬误”,即“经常批评社会理论不能完成

理论家起初并不打算追求的某些东西”，而事实上，“从内部评价各种理论——评价其内在的一贯性是更为恰当的”^⑤。梁启超启蒙小说理论的这些特点，正是以启蒙为目的，以报刊来进行舆论宣传，在对中层知识分子群体心理熟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

对于这一过程，梁启超在1915年《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一期发表《告小说家》一文，对十年前自己开展的这次“小说界革命”做出评价，他认为“其效不虚”：“所谓小说文学者，亦既蔚为大国，自余凡百述作之业，殆为所侵蚀以尽。试一浏览书肆，其出版物，除教科书外，什九皆小说也。手报纸而读之，除芜杂猥屑之记事外，皆小说及游戏文也。”^⑥小说作为一种主导文体，在“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之下，已经移到文学的中心位置。而经过梁启超理论的洗礼，士大夫已经不再将小说看作末流。与小说的巨大感染力相比，传统经学显得枯燥，欧美新学也不如小说好读：“举国士大夫不悦学之结果，《三传》束阁，《论语》当薪，欧美新学，仅浅尝焉为口耳之具，其偶有执卷，舍小说外殆无良伴。”^⑦从创作到阅读，小说无疑已经牢牢确立其地位：“故今日小说之势力，视十年前增加倍蓰什百，此事实之无能为讳者也。然则今后社会之命脉，操于小说家之手者泰半，抑章章明甚。”^⑧

但是，文学格局中小说的位置变化了，作为启蒙任务的新小说，其启蒙效果却不禁让梁启超感慨不已：“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什九则诲盗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于以煽诱举国青年子弟，使其桀黠者染于险谲钩距作奸犯科，而摹拟某种侦探小说中之节目。其柔靡者浸淫于目成魂与、窰墙钻穴，而自比于某种艳情小说之主人者。于是其思想习于污贱齷齪，其行谊习于邪曲放荡，其言论习于诡随尖刻。”^⑨新小说所要达到的启蒙效果显然没有达到，社会上假借于新小说之名，而大肆创作诲淫诲盗的作品，致使社会风气非但没有好转，反而“一落千丈”，他深深地担忧：“循此横流，更阅数年，中国殆不陆沉焉不止也。”^⑩

小说界革命是在中间知识分子阶层开展的，其造就了晚清的谴责小说、官场小说，具有批判的锋芒。同时造就一批青年思想者，他们在梁的文字魅力之下，获得了启蒙，最终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得力健将。梁启超所描述的社会现象，指的是底层社会的情形。但根据李孝悌在《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4》中对当时底层社会的考察，则梁启超所叙述的情形也并不完全符合史实。然梁启超这种心情却是真实而诚挚的。所谓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梁启超对启蒙的急切，对新民德的迫切，从上述论证已可见出。然而知识分子所作的努力，在短期之内，对于民间社会的影响，在形式上可以是巨大的，但在思想层面，却微乎其微。群体心理的特点，正如勒邦所说：“民族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有机体，因此就像其他有机体一样，它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累积过程发生变化。支配着人们的是传统，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他们能够轻易地给传统造成的变化，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样，仅仅是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而已。”^⑪知识分子的努力在底层民间，还经常会遭致改写与变形，借用民间熟悉的形式，采用民间社会的嗜好，而借以新小说之名。梁启超所谓借助侦探小说、艳情小说之名，正是如此。民间社会是“藏污纳垢”的，既有乞丐也为国难捐献，也有诲淫诲盗的大肆流行。但不能因为后者而否定小说界革命的业绩。相反，当时民间口语启蒙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与晚清维新派所掀起的启蒙运动有关。而大量青年知识分子投入行动，则不能说不受梁启超言论的影响。而这正与梁重视群体心理密切相关，从这一角度，也可以看出梁启超启蒙小说理论，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重视群体心理在梁启超启蒙文论，特别是“小说界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们不难发现，启蒙文论的言说方式、理论内涵，乃至理论的整体形态，正是与言说者对言说对象群体的心理特点的认识，以及为引导群体心理而构设的语言场景，有直接的对位关系。群体心理学的运用，

正是文学运动理论形态的生成机制。而这里的群体心理——不像已经创作出来的作品,我们根据作者的经历与作品的内涵来进行阐释;也不像读者接受理论,我们根据读者的反应、时代氛围、接受背景、作品内涵,来进行剖析。理论建构的心理学机制,是一种明确的、非个体性的、预设群体心理的实践行为。晚清启蒙主义文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理论、革命文学文论、工农兵文学运动理论等,无不如此。深入分析各个时期的理论建构目标与群体心理学的关系,并深入理解这些过程,对于更有效地把握各个文学运动阶段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 ① 严复:《原强》,载《直报》1895年3月4日至9日。
- ② 参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4》,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③ 孙本文:《近代社会学发展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5页、第51—52页。
- 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七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3页,第113页,第114页,第114页,第114页,第114—115页,第115页,第115页,第115页,第115页,第115页。
- ⑫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页。
- ⑮ 勒邦(Le Bon, Gustave),也译勒庞、鲁滂、黎邦、黎朋。
- ⑯ 勒邦:《群众心理》,钟建阁译,于1918年在《戊午杂志》上以《原群》为名刊行,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⑰⑱ 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年),熊哲宏、匡春英译,《弗洛伊德文集》六,长春出版社2004版,第61页。
- ⑲⑳㉑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特里·N.克拉克编,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214页,第217页,第235页,第236页。
- ㉒ 参见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2页。
- ㉓㉔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 ㉕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页。
- ㉖㉗㉘㉙㉚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新小说》1902年11月第1号。
- ㉛ 黄遵宪:《致饮冰室主人书》,《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下卷第490页。
- ㉜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卷第414页。
- ㉝ 郭沫若:《我的童年》,《郭沫若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卷第121页。
- ㉞ 吴其昌:《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 ㉟㊱ 黄坤:《梁启超与〈新民说〉》,梁启超著《新民说》,黄坤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版,第36—37页。
- ㊲ 参见李佃来《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210页。
- ㊳㊴ 参见勒文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刘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㊵㊶ 梁启超:《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载《新民丛报》1902年第14号。
- ㊷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一,第54页。
- ㊸㊹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三,第34页,第34—35页。
- ㊺ 衡南劫火仙:《小说之势力》,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卷第32页。
- ㊻㊼ 梁启超:《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饮冰室合集》专集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2页。
- ㊽ 《新小说》第1号、第2号“图像”栏文字说明。
- ㊾ 老棣:《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载《中外小说林》1907年第1卷第6期。
- ㊿ 觉我:《余之小说观》,载《小说林》1908年第10期。
- ①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320页。
- ②③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载《新小说》1902年11月第1号。
- ④⑤ 勒邦:《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版,第50页,第64页。
- ⑥ 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 ⑦⑧⑨⑩⑪⑫ 梁启超:《告小说家》,载《中华小说界》1915年第2卷第1期。

(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中文系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山木